

河洛春秋

河洛姓氏源流

□记者 孙钦良



五谷杂粮姓氏是最贴近生活的一类姓氏。人们以五谷杂粮为姓,说明了对农业的重视。

五谷杂粮姓氏

到底什么是五谷?古人说法并不一致。一说指黍、稷、菽、麦、稻,另一说指麻、黍、稷、麦、豆。古人曾把大麻子当食物,所以麻也归于粮食类,但后来麻主要用来织布,不再列为粮食类。如今,“五谷”泛指各种主粮,或称为五谷杂粮。

五谷杂粮姓氏是最贴近生活的一类姓氏。这里重点介绍麻、稷、麦、豆、粟姓,因为这些姓氏我市都有。

日前,我想了解一下人们对五谷姓氏知道多少。当问及此类姓氏中的名人时,50岁以上的人张口便说:粟裕、麦贤得、谷牧——粟裕是我军杰出军事家,大将军衔;麦贤得是1965年“八六”海战中我海军战斗英雄;谷牧是我国经济建设战线杰出领导人,曾任国务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等职,大家也都很容易熟悉。

但问80后或者90后,他们基本上都答不上来。其中一男生说:“麦当娜,她肯定姓麦!”我听了哭笑不得。

其实麦姓人口很少,宋代《百家姓》里找不到该姓。麦姓来源也很复杂,最早出自齐国。春秋战国时期,麦丘老人为齐桓公祝寿,从而得“麦丘”为封地,其后裔先以“麦丘”为姓,后又去掉“丘”字,以“麦”为姓。此外,隋朝何饶丰(号铁杖)屡立战功,皇上问他愿任何职,他答:“愿能日食斗麦足矣!”皇上遂赐他姓麦,他的子孙都姓麦。《洛阳市志》第2卷628页显示我市有麦姓人口。

中国自古是农业大国,古人提出“民以食为天”,而“食”主要是指五谷杂粮。五谷杂粮虽然平常,但在中国享有崇高地位,人们以五谷杂粮为姓,显示了对农业和稼穡的重视。在我市,我遇到过姓麻、姓谷的人,他们都为自己的姓氏而自豪。

宜阳县、洛宁县、偃师市均有谷姓。其中,偃师有谷姓1000多人,主要分布在庞村镇窑沟村。这个村有谷姓800多人,分为两大支,是从山西洪洞县迁人的。另外庞村镇西庞村也有谷姓50多人。

麻姓分布较广,族源复杂,河北、山西、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浙江等地均有分布。汉族、蒙古族、苗族、回族、壮族、土族、傈僳族、锡伯族都有此姓。麻姓来源较多:第一,春秋时期,有一楚国大夫姓熊,被封于麻(今湖北麻城),他的子孙姓麻。第二,春秋时期,齐国有大夫麻婴,他的子孙以其名字中的“麻”为姓。第三,出自汉、唐时期朝鲜半岛百济国都邑固麻,邑人中有以邑名为姓者。第四,源于官位,出自唐朝时期降麻官,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。第五,源于回族、壮族、蒙古族,他们汉化后改姓麻。在陕西和豫西地区,民国人物麻振武比较有名,此人绰号“麻老九”,陕西商州人,行伍出身,原是陕西靖国军第一路郭坚的部下,后投靠镇嵩军首领刘镇华,驻扎陕西大荔县一带,成为刘在陕西的走卒,盘踞称雄,震慑地方,当地妇孺一听他的名字便感到害怕。

关于稷姓,明代《万姓统谱》记载,这是一个较罕见姓氏,今北京和山西太原、运城等地有较多稷姓。其来源有多种,可以确定的是,其中有人是后稷的后代。《洛阳市志》第2卷628页显示我市有稷姓人口。

粟姓看上去很像少数民族姓氏,少数民族中也确有粟姓。粟姓出自最古老姓氏之一的粟陆氏,是伏羲的后人。粟姓也是明朝从山西洪洞县迁出的姓氏之一,分布于今河南、山东、河北、陕西、安徽等地。如果是河南的粟姓,很可能来自洪洞县。譬如偃师佃庄镇东大郊的粟姓人家,共有20多户,八九十人,就由山西洪洞县迁来;城关镇老城北关的粟姓也是明初从山西迁来的,当时他们兄弟二人都迁往外地,哥哥迁往山东,弟弟来到偃师。又传一代后,长门去了南阳,次门留在北关,目前已传至二十二代。此外,侗族中有粟姓,满族中也有粟姓。粟裕大将就是侗族人。

豆姓第一个渊源是出于姬姓。古代有泰豆氏,善于驭马驾车,周穆王时期,有个驾车能手造父,而他的驾驭本领就是从泰豆氏那里学来的。泰豆氏的后代都姓豆。另外,北魏时期,孝文帝来洛阳后,强迫鲜卑族汉化,其中鲜卑族慕容部的豆卢氏、拓跋部的纥豆陵氏、吐谷浑部的赤小豆氏,均在汉化改革过程中改成豆氏或莫氏。偃师市有豆姓14人。

百家姓



西安事变虽

在西安发生,但事变

前后,洛阳气氛十分紧

张,因为一切布控、营救活

动,均在洛阳展开。

□记者 孙钦良

西安事变前夕,洛阳的军情形势不利于张学良,而利于蒋介石。

事变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,在此之前,蒋介石已多次来洛阳构建其军事营垒。事实表明,由于洛阳驻军和飞机场在事变之后完全为蒋之心腹所用,所以在整个事变中,洛阳没有帮张学良半点忙,反而成了宋美龄营救老蒋的桥头堡和大本营。

西安事变发生后,因洛阳距西安很近,又有机场和陇海线的便利交通,遂成为南京和西安联系的重要纽带以及各方折冲、谈判的中间站、谈判桌,成为南京政府高官们急急赶赴的焦点城市,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后花园。

那么,让我们来分析一下,洛阳当时的军情和设施为何利于蒋介石。

首先,我们要说得远一点:洛阳的行都地位,使这里的军事设施得到了强化,而这些设施,又恰好在此时为蒋所用。1932年“一·二八”事变后,国民政府、国民党中央就考虑迁都了,但迁都的第一目标不是重庆,而是洛阳。迁都洛阳有两大原因:第一,洛阳自古是帝都,王气氤氲,千载浩荡,风水上自然不亚于南京。第二,洛阳是内陆城市,可避日军锋芒,又有机场和铁路线,如果日军逼近,可西驰西安,再撤往巴蜀。

1932年1月30日,国民党南京政府迁都洛阳,定洛阳为行都。国民党政府驻原河南府衙门(今老城青年宫附近),蒋介石2月3日抵洛,洛阳交通立刻提速:洛阳车站增开1、2次特快列车,来往于洛阳、浦口之间,同时加开洛阳至开封3、4次特快列车。3月5日,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西工召开,成立了军事委员会,蒋介石任委员长——“蒋委员长”这一重要职务,可是在洛阳获得的!蒋遂下大力气打造洛阳军事设施。

接下来,洛阳安装广播电台并试播,筹建电厂并发电,创设市区电话,开设中央银行洛阳办事处,设立了中央航空学校洛阳分校,培训飞行员数百名。当时还设立了中央军校洛阳分校,挑选4000多名优秀官兵入校学习,调来祝绍周担任校长。此人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,对老蒋最为忠诚,西安事变时担任巩洛警备司令,对营救老蒋起了最关键的作用。

军校、机场、陇海铁路,加上附近的孝义(巩县境内)兵工厂,使洛阳的军事设施上了个台阶,其战略地位显得更加重要,而这些设施都为后来营救老蒋发挥了作用。而张学良的东北军当时在洛阳有炮兵第6旅的两个炮团,还有在洛阳分校、军士教导队深造的408人,按说也是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,可惜在事变之千钧一发之际,这支武装力量没有帮助张学良,反而倒向老蒋一边——此乃后话,后再讲。

话说1936年10月31日,是老蒋的五十寿诞。此前一段时间,首都南京(南京政府仅迁洛一年,此时已还都南京)气氛很喜庆,那些军政大员都在为祝贺老蒋寿诞而开动脑筋,准备寿礼。10月上旬刚过,蒋介石就以“避寿”为名,从南京来到洛阳,住到了中央军校洛阳分校。

他一住就是30多天,这并非为了避寿,而是在敦促西安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前去陕北“剿共”。但张学良的心思在抗日上,对“剿共”不积极,老蒋发现后,就做了两手准备,把自己的嫡系精锐260个团30万人全部北调,摆在平汉路郑州至汉口段、陇海路郑州至潼关段,并调陈诚、蒋鼎文、卫立煌等20余名军政要员到西安待命。他任命蒋鼎文为西北“剿共”前敌总司令,陈诚以军政部次长的身份驻前方进行督战,形成对陕北红军的包围,并对东北军、十七路军形成威胁。

蒋介石在洛阳把一切安排妥当后,于10月22日亲自飞到西安,要求张学良、杨虎城加紧围剿陕北红军,否则便将东北军调往福建,十七路军调往安徽,将陕、甘两省让给中央军,由中央军负责“剿共”。这种安排杀气腾腾,实际上就是一个“逼”字。这对张学良、杨虎城形成了压力,他们面临着艰难而痛苦的选择。

有文献这样记载:张学良心情复杂,日军侵华祸害东北,他的父亲张作霖也被日本人炸死在皇姑屯。而作为东北军首领,他不能抵抗日军,在全国人民面前落了个“不抵抗将军”的屈辱称号,国仇家恨,使他不安。10月30日晚,张学良为了劝蒋抗日,特约山西土皇帝阎锡山、绥远省主席兼35军军长傅作义和东北军的王以哲、何柱国两位军长,坐飞机赶到洛阳,想趁蒋过五十大寿之际,对蒋介石进行劝说。

蒋介石看到张学良一行数人前来祝寿,心情很好。但张学良寒暄之后,马上切入主题,提出“停止内战,一致抗日”。蒋一听,很生气:原来你不是来祝寿的呀!他脸上露出怒气,大声训斥张学良:“抗日!又来提抗日!你作为一名军人,难道分不清

西安事变前夕的洛阳

洛 秋

洛阳历代战役系列(四十六)

敌人的远近?共产党就在你的身旁捣乱,而日本人远在千里之外。我们应先消灭眼前的敌人,没有了后顾之忧,再全力解决日本人的问题!”张学良说:“东北军抗日情绪激烈,喊着要‘打回老家去’!他们宁愿战死在抗日战场上,也不愿牺牲在内战上啊!”蒋怒道:“你应该清楚,我们的国策就是攘外必先安内!”说完脸扭向一边,再不搭理张学良。陪同张学良前来的阎锡山老奸巨猾,一看蒋生气了,急忙拉着张学良与蒋告辞了。

这次会见使张学良心灰意冷。难道接下来只能看着老蒋在洛阳过五十大寿了吗?不行!反正明天还有机会,寿宴之后我还要劝他抗日——张学良这样想着,就在洛阳住下了。接下来的事情怎样呢?请看下篇。

